

第 一 章

开 启 改 革 开 放 新 阶 段

◎ 全 球 大 角 力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整个世界大势展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观：“苏联”一个号称为超级大国的“北极熊”破败了，给人们留下记忆的是一个具有 70 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其同命相连的是，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改辙易帜。究其根源，虽有原因种种，但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与此相反，在亚洲，有几个原本名不见经传国家和地区却在迅速崛起，被人们称之为“小龙”、“小虎”。它们之所以会令世人刮目相看，原因也就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给它们带来了良好的声誉。面对这变幻莫测的多彩世界，从中应该汲取什么？怎样才能赶上世界发展潮流而又不蹈别人的覆辙。对此，中国领导人在思考，总设计师更是无时不在思考……

（一）苏东剧变的启示。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世界原有的两极格局被打破，一个多极化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种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同时在机遇的背后也充满着压力和挑战。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人们在思考，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更无时不在思考：怎样才能在新格局中实现民族的振兴，使本民族在这个多极世界里迅

速崛起。

如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大格局中作横向比较，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历史责任感就会油然而生，或许，只有透过这个视角，人们才更能理解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的一片苦心。提到“契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左”的干扰，它曾几度从我们身边溜过。

第一次机遇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这时正值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兴起，面对这次机遇，德国、日本抓住了机会，因而使本国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我国由于这时正在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正在大搞阶级斗争，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这样，我们不仅被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落下，而且进一步被发达国家甩得更远。

第二次机遇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这一时期正值发达国家搞技术的更新换代，对于一些相对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正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好机会，而这时我们仍热心于阶级斗争，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相反，亚洲“四小龙”却抓住了这次机遇，因而经济迅速腾飞，实现了现代化。

正因为错过了这两次机会，所以我国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才迅速拉大。回眸历史，人们不难记起，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与日本相比，经济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落在了人家的后面。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曾喜欢与印度作比较，认为我国的经济水平优于对方。曾几何时，印度和我国的周边国家都正在起飞，而我国曾经一度拥有的优越感也被机遇的丧失而耗尽。

更为冷酷的现实是，苏东国家由于未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而

最终解体。

从 1989 年 6 月波兰大选开始，东欧风云突变，到年底出现了雪崩式的“多米诺效应”。波兰团结工会上台执政，民德、保、捷、匈四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遭到严重破坏；12 月，罗马尼亚事件后，罗共已不复存在。半年之内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大，为始料所不及的。1990 年上半年，东欧各国共产党队伍又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经过大选或地方选举，绝大多数丧失了政权，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反对派占据了政治舞台。之后，阿、南情况也急剧变化，共产党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1991 年，苏联“8·19 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受到沉重打击，政治上丧失政权，组织上陷于瘫痪，其活动被迫中止。就整个东欧共产党国家来说，都发生了剧变。苏联解体分裂成 15 个国家，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即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

1991 年 12 月 25 日，西方正在庆祝圣诞节之时，在克里姆林宫却发生了一次举世关注的大事件：飘扬了 69 个春秋的苏联国旗降落下来。这意味着显赫一时、叱咤风云的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给自己画上了一个“难圆”的句号。

昔日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顷刻之间在剧烈的事变中瓦解沉没了，既无坦克声也无硝烟味，这是为什么？对此，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不能不引起焦灼的思索。毋庸讳言，对于这样一个广泛而又复杂的世界性问题，要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决非易事，但有一点却使人们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不改革，不加快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报纸、广播、电台、电视，不断地报道苏东剧变后的状态：共产党权力被剥夺，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落难，共产党财产被没收，原官员和秘密警察受迫害；经济呈滑坡趋势，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人民

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民族矛盾尖锐激化，民族冲突战火连天，国家解体……

当然，也有人从不同的角度总结苏东剧变，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直接结果；有人认为是这些国家都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执政党，没有一个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领导核心，在关键时刻，领导层的分歧导致了党的分裂，给反对派夺权提供了机会；党的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致使在重大政策上一再失误；当要求民主的浪潮袭来时，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错误地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理论，使各种思潮纷纷出笼，反对派组织和政党林立，走多党制议会民主道路成为一股洪流，最终冲垮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内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主要是没有实际地体现全党对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监督机制。等等。诚然，上述因素对于苏东剧变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人们更应该看到，苏东剧变最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经济基础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没搞好，体制有问题，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甚至是广大党员的强烈不满。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悲剧，典型地呈现出这样的冲突性社会状态。

就苏联的情况而言，它的经济体制从 30 年代建立之后直到解体，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其理论基础是产品经济论，即极端排斥市场调节，视商品经济为异己。其运行机制则依靠权力的指令来构建。经济结构是准军事型的超重结构。不可否认，苏联经济体制在其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起过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使苏联从沙俄时代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几十年当中跻身于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列。从这方面讲，功不可没。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缺乏平衡和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缺乏创新力，阻碍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

一旦权力和指令的结构发生震动，经济体制的运转便会发生震荡，导致原本已经功能衰竭的经济体制失去生存能力。

经济失败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苏联经济体制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原来功能逐渐衰退，致使效率低下，激励减弱，运行失灵。从苏联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些效率指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 1951 年至 1955 年间的 11.4% 下降为 1966 年至 1970 年间的 7.7% 即降低了 1/3。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的情况是：社会总产值，1966 年至 1970 年为 7.4%，1971 年至 1975 年为 6.3%，1976 年至 1980 年为 4.2%，1981 年至 1985 年为 3.3%，到 1990 年为 2%；国民收入，1966 年至 1970 年为 7.8%，1971 年至 1975 年为 5.7%，1976 年至 1980 年为 4.3%，1981 年至 1985 年为 3.2%，到 1990 年为 4%。再从投资效益低和基金产值率来看，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产出的国民收入，由 1960 年的 72 戈比降为 1970 年的 54 戈比，1980 年又降至 40 戈比，到 1984 年只为 38 戈比。苏联的基金产值率在 24 年里几乎降低了一半。

这种体制僵硬效益低下的结果，使得苏联的经济危机最终成为由慢性发展变成急性发作。所以，原体制的一切教义都走向其反面。从产品经济观滑到市场拜物教；从指令性经济走到无政府状态；从党包揽一切经济决策走到解散共产党。

在苏联的垮台问题上，军备竞赛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是军备竞赛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

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逊于美国，但军费开支却稍高于美国。仅此一点，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损害程度便可想而知了。过去苏联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显然夸大了苏联的经济实力。按苏联国家统

计委员会的计算,1987年,苏联国家收入总额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57%。但按《美国统计摘要》计算,1987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46.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1987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9.67%,人均GNP为美国的34.66%。此外,其工业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9%。在这种状态下,苏联拼命地维持军事上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均势,其霸权地位,完全是靠死拼硬撑的结果,因而不可能长久。1991年5月,俄罗斯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曾透露,苏联40%的生产能力,都用在了军事生产上。这种畸形经济结构,非垮台不可。

再从体制设计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来看,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是传统工业化时期产品经济模式的设计产物。从理论上,它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它主要表现在关于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作为体制设计的现实指导,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排斥商品和货币的。可回到现实中来,苏联当时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商品奇缺,人民生活困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任务重,时间紧,用通常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商业轨道,不能保证经济生活的运行。此外,当时苏联工业化建设的主导思想,是出于政治考虑保卫苏维埃,而不是出于经济效益。尽管重工业大都亏损,而斯大林则誉之为资本主义经济无可比拟的“高级盈利”。这与产品经济理论恰好合拍,从而强化了产品经济观。它不仅表现在流通和交换领域,也渗入社会经济的深层结构。从限制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到否认经济利益差别,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乃至高度集权,行政指令等,整个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无不体现产品经济的精神。

这种产品经济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特定的作用。

但是，它有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既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又不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经济利益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劳动者实际拥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及其产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产品经济扭曲了这些关系，因而没有生命力。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把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经济体制固定化、神圣化了，不认为它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革，这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绷得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导致突变。从苏东剧变的经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时邓小平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这种总结，可以说是对苏东剧变的教训的深刻反思。苏东剧变给我们提供了血的教训，这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奋起，然而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压力和挑战，这也是我们不得不直面以对的严峻现实。

（二）来自周边的压力与挑战。

打开世界经济发展级差图，人们就会从这种曲线变化中清楚地看到，中国周边那些曾被中国人认为是不太发达的昔日“蛮夷小邦”，如今已远远地把中国抛在了后边。

目前，我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被称作“四小龙”的我国的台湾省、香港和韩国、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

台湾省 1952 年至 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平均 8.4% 的速度增长，1988 年以来年平均为 7.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2 年为 194 美元 1991 年达到 8815 美元；进出口“贸易”1950 年至 1975 年间，只有 3 年为顺差，而 1976 年至今，每年都是顺差，1991 年外贸总额达到 1391 亿美元，高于大陆的 1357 亿美元；1985 年

仍有外债 47.65 亿美元,1988 年以后,已没有外债负担,而到 1991 年底,外汇储备已达 824 亿美元。台湾省经济的较快发展固然有着重要外因,但其不断进行调整的内因也不可忽视。

1949 年至 1952 年,台湾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业有了较快发展。1953 年至 1960 年,采取“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政策,鼓励和保护创办替代工业,使工业产值明显上升。1961 年至 1973 年,由“进口替代”政策转向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重点发展纺织、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吸引外商投资,设立出口加工区,引进技术设备,大力开发新产品,积极鼓励出口,使工业产品出口大大增加。

1974 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朝着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经济方向发展,加上工资成本上升,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加强,使出口面临一定困难。台湾对此转而采取分散出口政策,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升级,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香港 1945 年至 1950 年,主要恢复和发展转口贸易和有关服务业,194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418 港元。1951 年至 1960 年,经济由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其产品以外销为目的。1961 年至 1970 年,大力发展制造业。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工业向多元化、高质化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香港经济进入国际化新阶段,成为区域性的金融、航运、贸易、旅游、信息中心。1992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6000 美元。

韩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采取了发展教育这一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初,又采取“出口主导型开发战略”利用外国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发展出口加工业,同时对纺织、食品等工业进行投资建设。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实施发展重化工业方针，并大量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推行新技术产业化道路，加强对海外投资，保持了经济发展势头。1971 年至 1991 年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 6%—11.3% 之间。198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4400 美元。

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只有 600 多平方公里、幅员很小、地质情况复杂、自然资源贫乏、连淡水都要进口的岛国。但就是这样的环境，新加坡却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两个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果。这是新加坡实施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政策的结果。新加坡 1959 年独立后，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进出口货物基本免税，政府对企业经济活动不加干预，只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对外贸易，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进而促进了工业化的完成。近年来更注重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高科技工业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971 年至 1980 年为 9%，1991 年为 7.7%。1989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10450 美元。新加坡在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加坡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通过学校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经过长期努力，他们把自己小小的岛国建成了具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美丽、清新、整洁、舒适的自然环境，从而形成了对世界各地游客极具吸引力的“花园国家”。

在中国周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抓住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传递的有利时机，利用较之以往宽松得多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取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3.6%，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 7.5%。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2.8%，东亚地区为 8%。20 世纪 90 年代按标准估算模式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为

2.8%，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为 7.7%，其中，亚洲“四小龙”为 7.2%，东盟四国为 6.2%，中国大陆为 9.1%，增长率均比世界经济增长平均高 5 个百分点左右。^① 由于经济增长较快，所以贸易中心开始向这一地区转移。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亚太地区对外贸易额已占世界总贸易额的 1/4，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 1/3。1980 年世界最大的 20 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有 4 个，1991 年已达 9 个。美国 1992 年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值达到 2190 亿美元，约占美国总出口的 49%；在进口总值中来自亚太地区的进口值为 3130 亿美元，约占美国总进口的 57%。面对亚太地区这种迅猛的发展势头，一些未来学家曾作出这样的估算：因地理、人口、经济环境和购买力等因素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地区。

目前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按经济势力划分，大体上呈宝塔形。位于塔尖的是日本；第二层的有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第三层是新加坡之外的东盟四国，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第四层是南亚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和阿富汗；第五层就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

周边的崛起，既是刺激和挑战，同时也是示范和机遇。争雄经济霸主的日本与强势推进的亚洲“四小龙”都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咄咄逼人之势。台湾《天下》杂志 1988 年 7 月 1 日刊登了一篇分析 1967 年至 1986 年 20 年来世界十大国（美、日、苏、西德、法、意、英、中、加、巴西）在全球总生产额中所占的地位变化的文章。文章指出，西方各大国除西德、意大利地位略为上升外，其余各国均已下降，其中美国衰退尤为严重，虽仍为第一强国，但比重却由占世界生产总额 33.8% 降至 26.6%。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日

^① 《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第 1 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0 页

本却从 5.2% 猛增为 12.4% 由 20 年前的世界老三取代了苏联而成为今日世界经济亚军。亚洲“四小龙”虽未进入十强，但近 20 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却平均以近 10% 的速度增长，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中的佼佼者，其增长速度之快，不但远远超过美国、西欧，甚至连日本也望尘莫及。文章结论是，“国力竞赛，东升西落”。事实的确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 世纪 50 年代产生了西德奇迹，20 世纪 60 年代崛起了日本，20 世纪 70 年代腾飞起亚洲“四小龙”。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经济增长也让人刮目相看。一个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正初现轮廓，开始同北美和欧洲共同体经济集团分庭抗礼。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人均 GNP 不足 100 美元，1988 年已是 21050 美元，仅次于瑞士；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经济起飞时，台湾、韩国人均 GNP 分别为 100 美元左右和 83 美元，1988 年台湾已超过 7000 美元，韩国亦达到 3600 多美元，香港、新加坡已达 8000 多美元，这“四小龙”的经济水平超过欧洲的西班牙、希腊、爱尔兰。

1988 年日本年出口额达 2647 亿美元，面积和人口都只与我国浙江省差不多的韩国，其年出口额 600 多亿美元，大大超过我国年出口总额。面积比海南岛大不了许多的我国台湾省，年出口额也在 600 亿美元以上。东亚地区出口的商品已远非 20 世纪 50 年代的初级农矿产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轻纺工业品，它的产品构成、市场分布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产品早已充斥美国市场，令“山姆大叔”徒唤奈何。韩国也已向另一超级经济强国——德国市场发起了挑战。

当世界首富的美国正日趋蜕变为世界最大债务国时，日本却成了最大资本输出国。当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国被沉重的债务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台湾却有 800 亿美元的盈余正愁

找不到出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日本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韩国虽债台高筑，但由于其年出口额增长快，外汇收入高，因而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经济发展伴随着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的转换。东亚不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上都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然而，现在东亚地区早已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换。从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各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日本现在已是服务主导型的后工业经济了。台湾、韩国则早已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香港、新加坡基本上没有农业，乃城邦经济，也从以前单一的转口贸易经济过渡到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二次大战前，东亚地区只有东京算得上国际大都会。香港、新加坡、台北、汉城尚名不见经传，而今均跻身于国际金融、贸易、信息、运输、商品集散中心之列。

如今，东亚地区经济正稳步发展，日本雄心勃勃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989 年美国取消了以往给亚洲“四小龙”贸易普惠制待遇。这意味着“四小龙”已从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中毕业，向成熟型的工业化经济迈进。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可望在 20 世纪 90 年代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

面对着世界经济中心悄悄东移的态势，国际上许多人士纷纷预言，21 世纪亚太地区将取代北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21 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马克思 1848 年曾赞叹过 18、19 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使欧洲资产阶级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二次大战后不到半个世纪内，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获得的经济成就及速度又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工业革命。

近些年，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正在崛起的“亚洲第五条龙”泰

国，以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特色，正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瞩目。泰国从 1961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起，到 1985 年的 25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7.0%（按 1972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60 年的 100 美元增加到 1985 年的 900 美元，1988 年超过 1000 美元。按世界银行 1980 年规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410 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泰国早在 70 年代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一时期，制造业产值率增长率 10.7% 增长了 8 倍，工厂数从 1960 年的 14244 家增加到 1985 年的 90000 多家，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 1960 年的 12% 提高到 1985 年的 21% 以上，1981 年制造业部门的工人达 150 万人。按联合国的标准，泰国已经在 70 年代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实现了“半工业化”（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20%）。制造业产品出口值从 1961 年的 1.1 亿多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36.29%）。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连续几年的衰退，给不少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困难，而作为开放性经济的泰国，由于它同国际间的贸易极为广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商品价格下跌的较大冲击。但这几年泰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充分表现了泰国经济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马来西亚也已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据大众银行的分析结论，马来西亚已取得可观的经济增长。马来西亚很有潜力超越其邻国泰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以蓬勃的经济作后盾，稳定的政治为前提，在丰富的天然资源、良好的基本设施及人力资源的支持下，马来西亚在 2030 年成为工业先进国家的目标可望实现。

面对周边国家的大发展，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来说，无疑既是压力又是挑战。

（三）对全球发展态势的冷静思考。

周边国家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大发展的一个缩影，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大发展，并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国际化日益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态势下，一些地理邻近、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容易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容易形成利害与共、一致对外的经济集团，即区域性的经济集团。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一体化经济集团的建立，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新特点。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过一体化经济集团。只不过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集团化趋势更为明显罢了。

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发展欧洲经济共同体。20 世纪 80 年代，欧共体成员国增加到 12 个，1985 年又决定在 1992 年底以前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其“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1991 年 10 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建成欧洲经济贸易区达成协议。根据 1991 年底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关于建立欧洲联盟条约的规定，在 20 世纪末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发行单一货币，加速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推进。

在北美，1988 年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10 年内两国完全取消关税，加强投资和劳务合作。1990 年 6 月，美国总统布什又宣布了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新政策，即以自由贸易、改善拉美投资条件和减轻拉美债务为基础，建立起新的“伙伴关系”。这标志着由过去以美援为基础以美国为盟主的泛美政治同盟，将转变为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美国占主导的泛美经济联盟。

在亚洲，20 世纪 80 年代，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区内各国（含地区）的相互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迅速增长；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转移过程中已经形成一种动态的和多层次的劳动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开始出现某些水平分

工形式，而且有水平分工比重逐渐扩大、垂直分工相对缩小的趋势。1987 年底，日本以通产省、外务省、经济企划厅和首相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为核心，正式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1989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召开了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与会 12 国都派了外交部长和经济贸易部长参加会议，这标志着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官方协调因素在增加。专家预计，一个以日本和东亚国家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将有可能形成区域性经济群体。经济集团化，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和国际竞争激烈的产物，在这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处境就更加困难。

应该看到，挑战与机遇同在，风险与利益并存。在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面前，中国唯有推进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历史契机，自强自立，走向世界。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也必须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形势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发展生产力，也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基本、最有说服力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对生产力的发展重视不够，吃了大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且不说社会主义老是穷站不住，就是经济发展相对慢一些也难站得住。过去前东德的经济成绩很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也超过西班牙、葡萄牙等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与西德一比，“就落后”了。西德的小汽车、家用电器与东

德的同类产品一比，就把东德许多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冲掉了。波兰党的一位负责人在谈到波党失败的教训时说：“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反思。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英国、美国、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使人均产出增长 7 倍分别用了 58 年、47 年和 34 年的时间，土耳其、巴西、韩国分别用了 20 年、18 年和 11 年的时间；可中国却只用了 10 年时间。我们可以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但决不能因此而妄自尊大，丧失紧迫感。中国在发展，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发展，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慢，但至今还没有有力证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相对地位已有显著改观。1980 年至 1989 年，按人均 GNP 从低到高排列，我国从世界第 24 位降到第 21 位，印度则从第 19 位上升到第 20 位；斯里兰卡从低于我国的第 21 位上升到高于我国的第 31 位。与低收入国家人均 GNP 的平均值相比，我国从高出 12% 降低到仅高出 6%。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仍在扩大，1980 年我国人均 GNP 相当于美国的 2.55%，1989 年下降为 1.67%。

当然，简单的统计数字未必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复杂现象，但至少可以说明，经济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国际现象，因而必然是一种国际竞赛，没有速度就没有国际地位，步履蹒跚的国家将成为可悲的落伍者。

◎“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

苏东剧变和周边国家的迅猛发展，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加快发展。前进，是唯一的出路，裹足不前、墨守成规只能是死路一条。大胆地向前走这

一条中国共产党人已坚定不移，于是价格闯关便成了当时的改革决策。

然而，这一关却没有闯好，挫折向人们发出了警告，随之而来的矛盾也出现了。这种矛盾既影响到了中国国民，也对国家的决策发出“问号”，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对此应作出再探讨。

(一)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深化改革，通过改革来加快发展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是早有认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也正是按照这样一条路子在不断地前进。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十余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特别是 1984 年到 1988 年的 5 年时间，我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台阶。这 5 年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1984 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趋于尖锐。这些矛盾又成为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阻碍。

第一，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84 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过热状态，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连续 4 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供需差率 1983 年为 4.7%，1987 年扩大到 13.6%。为了供应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都高于经济的增长。1987 年底，我国的货币流通量已达 1454 亿元，比 1983 年增加 174%。货币量的高增长，其直接结果必然是带动物价的普遍上升。1987 年在没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情况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仍比上年平均上升 7.3%；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 8.8%，有些大城市上升幅度已突破 10%。1987 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物价上涨高峰年。